

驳杂与务实

《抱朴子外篇》政治思想新研



Multifarious and Pragmatic

A New Research of Political Thinking
in *Baopuzi Waipian*

范江涛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驳杂与务实

《抱朴子外篇》政治思想新研

Multifarious and Pragmatic

A New Research of Political Thinking
in *Baopuzi Waipian*

范江涛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驳杂与务实:《抱朴子外篇》政治思想新研 / 范江涛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308-13949-6

I. ①驳… II. ①范… III. ①古典哲学—中国—东晋
时代 ②《抱朴子外篇》—政治思想—研究 IV. ①B235.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4706 号

驳杂与务实:《抱朴子外篇》政治思想新研

范江涛 著

策划编辑 张琛
责任编辑 姜井勇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金旭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44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949-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b.tmall.com>

F 殷音 (代自序)

Foreword

犹记得数年前的一则“旧闻”：在我国历史学界，北京大学历史系当属翘楚，但每年的招生情况却不尽如人意；自 2006 年易中天先生百家讲坛“品评三国”之后，北大历史系突然生源爆满。这可能是“街谈巷说”，也许其中戏谑成分更多。于丹读《论语》之后，各地书店一时洛阳纸贵，甚至 2007 年陪伴恩师陈启云先生住院期间，医院护士听闻我们是学历史的，便连忙请教关于《论语》的事情。近年来“鉴宝”、“收藏”之类节目大热，各高校考古专业亦炙手可热。所谓“历史”，从来没有如此受到国人的钟爱。吊诡的是，在国人看来，历史虽然挺“好玩”，但似乎没啥用途，至多是茶余饭后闲扯几句；有的学生报考历史专业研究生，也并非出自对史学的喜好，而是因为其相对容易考取。2006 年我自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毕业后，找工作四处碰壁，心中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有什么用？

历史不能扩大内需、刺激 GDP 增长，不能研发新科技、创造新行业，历史学家甚至不能像文学家那样获得诺贝尔奖，在现代社会仿佛一无用处，但是历史的价值却丝毫不会因此而有所消亡。历史其实就是过去，如果我们不记得昨天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就不会知道今天要做什么；如果我们不了解过去，那么我们就不能把握未来。

历史学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其所依托的对象首先是“过去”，而这个“过



去”是极难“精确复原”的。当代历史学者只能凭借现存资料(史料或 Sources),对过去进行重新建构解释,“将零散而混乱的过去信息变成有条理、有意义的历史知识”^①,以期得到相对正确的认识。几千年来,保存至今的史料虽浩如烟海,“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但与“过去”相比仍然是九牛一毛。与此相比,思想文化史(Intellectual History)^②的研究对象则似乎更难以捉摸了,尤其是本书所研究的对象——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外篇》,其所依托的史料似乎只有现代人整理好的文本,区区不过十万余字。以十万余字“史料”复原历史,似乎不太可行。

我国史学界的传统是“史学即史料学”,“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讲求“一切从史料出发,不谈理论和方法,不可越雷池半步”,这恐怕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所遗留的。现存史料如何能够完整反映历史原貌?仅仅依靠实证是不行的。实证首先要求有足够多的“样本”,而这恰恰是史学研究的最大瓶颈。例如,汉代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大约有数百人,能够列入史书记载(《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的不过数十人,而这数十人也并非都有详细记录。以10%(甚至是1%)的资料“实证”历史原貌,恐怕是有问题的。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必须借助记载“思想文化”的文献;而历史上刀兵火焚,许多珍贵文献难免片言无存。以葛洪为例,“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为《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这其中除了《抱朴子内外篇》和《神仙传》大部分得以留存外,其余部分大多亡佚。如果仅仅从残留文献“实证”,那么恐怕难以得出允当结论;以史料“实证”历史是难以行得通的。^③ 当代西方学术真理观认为,真理可以通过数种不同的方式获得:(1)对当论(Correspon-

① 李剑明：《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78页。

② 本书以“思想文化史”为研究角度，突出思想和文化的特殊关系，并以此区别“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y)等。相关讨论，参看陈启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③ 近年来国内史学中有“简牍学”一门，颇为炙手可热。新出土的材料可为我们提供丰富真实的史实，有助于复原历史原貌，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臧兵法》的出土即解决了《齐孙子》和《吴孙子》等问题。但是，极个别学者走向极端，完全以地下材料否定地上材料，恐怕也是不正确的。以《老子》为例，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学界研究发现与通行本《老子》差异颇大，因此便有否定通行本《老子》之议。研究史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相参考，仅执一方并不可取。

dence);(2)圆融论(Coherence);(3)实用效应论(Practical and/or Pragmatic Criteria);(4)诠释功效论(Interpretive-hermeneutic Value);(5)另有为应对后现代主义而提出的新建构实在论(Constructive Realism),等等。以上数种论述中都对应着不同的方法,“实证”不过属于其中的一种(对当论)而已;当面临“样本”不足以支撑“实证”时,便须借助于“分析”的力量。

如何“分析”史料?史料是“死”的,不会说话;而史料的研究者却是活的,其对于史料拥有不同的解读能力,史料和研究者都有其主体性。^①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首先必须重视“文本”(Text)的作用。关于《抱朴子外篇》的“文本”基本上没有争议,但是如何解读就需要研究者费尽思量。研究“文本”首先需要研究“人”,因为“人”是“文本”的创作者,“文本”中必然包含“人”的思想。作者的成长经历、家世背景,等等,这是研究者在研究“文本”之前必须了解的因素。其次,“人”生活在社会中,“人/文本”都不可能超越时代。“人”的思想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必定与其个人经历和社会大背景有关。将“人/文本”放回“原始语境”中考察,不但有助于研究者在更宽广的背景下了解“人”为什么会提出这些思想,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被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倾向性解释所迷惑,进而相对准确地把握“文本”的原始含义。

魏晋时期是一个公认的“矛盾”时期:一是国家的连年战乱、民不聊生;二是士人的优容自如、怡然自得。从西汉时期士人“视青紫如俯拾草芥”到东汉时期的“隐逸”、“独行”,从曹魏时期阮籍、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到西晋初年何曾、石崇的“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士人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而变化的最终结果,便是产生了一个看似“矛盾”的葛洪:幼年以儒学知名,晚年却走向道教;所著文字“《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攘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矛盾”的“人/文本”,首先需要从大背景上来考虑分析。

另一方面,由于史料的局限性,研究者基本排除了利用新发现的材料来进行创新的可能,如此我们只能从方法、角度上下手。面对同样的材料,不同的研究者关注的角度不同,其结论也往往各具新意。相较于《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外篇》思想驳杂,涉及隐逸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批判思想、文学思想等,要从整体上加以理解更为困难。但是,“人”的思想往往不是一种单纯的体系,更何况葛洪兼综儒道,如果仅仅从某些特定的角度视之,难免陷入盲人摸象的迷津。

① 张荣明:《如何让史料说话》,《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C 目 录

第一章 葛洪传略及其著作分析	001
一、葛洪行状	001
二、葛洪卒年考	005
(一)关于葛洪卒年的各种争论	005
(二)葛洪卒年各说法之辨析	008
(三)“八十一岁说”之由来	012
三、出入儒道的汉魏知识分子	016
四、《抱朴子外篇》文本分析	021
(一)字数分析	022
(二)篇章分析	026
(三)次序分析	026
(四)《行品》篇分析	027
第二章 《抱朴子外篇》的哲学观和人生观	030
一、言行观	030
(一)先秦两汉时期对于“言”、“行”的讨论	031
(二)重“言”，慎“言”	035
(三)“言”胜于“行”	041



二、人生观	044
(一)“三不朽”的提出与发展	045
(二)弃“立功”而“立德”、“立言”	046
(三)人生价值理想的背景和原因	052
三、隐逸观	055
(一)隐逸的产生和发展	056
(二)隐逸思想的具体内容	059
(三)“出处同归”与魏晋士风	064
第三章 《抱朴子外篇》政治思想研究	066
一、有君、无君之辨	066
(一)鲍敬言的“无君论”	069
(二)葛洪的“有君论”	073
(三)无君与有君之辨	076
二、君臣之道	077
(一)先秦以来的君臣关系	077
(二)君的标准	079
(三)臣的标准	085
(四)反对废立君主	088
三、以“礼”治国	091
(一)以“礼”为主	092
(二)以“刑”为辅	096
(三)恢复肉刑	099
四、举贤任能	103
(一)举贤的重要性	104
(二)选贤的方式	106
(三)重视基层官吏	112
第四章 《抱朴子外篇》社会思想研究	115
一、批判士风	115
(一)汉末、东吴政治之弊端	115
(二)批评浮华交游	117
(三)反对酗酒之风	119
(四)待人以礼	120
二、仁 明	124
(一)仁、明的提出和发展	124

(二)《抱朴子外篇》中对仁、明的理解	126
三、贵 今	131
(一)魏晋之前的历史观	131
(二)历史变化论	135
(三)今不弱古的进化观	136
四、重 文	139
(一)先秦两汉以来的文学发展	139
(二)对文章的重视	141
(三)重视文章的实用性	143
(四)文章发展观	146
第五章 论诸子	149
一、儒道关系	149
(一)“道”与“道家”	150
(二)“道”和“儒”的文本分析	152
(三)《抱朴子外篇》中对于“道家”和“儒家”的认识	156
(四)《抱朴子内篇》中葛洪对“道”、“儒”的认识	159
二、论老庄墨杨	163
(一)论老庄	164
(二)论墨子	167
(三)论杨朱	175
结 语	177
附 录	179
附录一 研究综述	179
附录二 葛洪及《抱朴子》部分研究目录	194
附录三 书目勘误表	201
参考文献	204
索 引	213
后 记	215

第一章

葛洪传略及其著作分析

对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抱朴子外篇》，首先需要对其作者葛洪的生平加以考证，以期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葛洪一生历经西晋、东晋两朝，或隐居或入仕，或学儒或学道，其经历较为复杂，但大体上还是有迹可循的。

一、葛洪行状

曹魏元帝咸熙二年(公元 265 年)，两年前伐灭蜀汉之功绩犹存，权臣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袭父爵为晋王。数月后，这位“新”晋王便逼魏元帝曹奂禅让，自己即位为帝建立晋朝。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司马氏灭吴统一中国，结束了自东汉以来数十年的分裂局面。大一统局面既成，士民安居乐业可待。但是仅仅十年之后，晋朝便发生了“八王之乱”，祸连十余年：

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闭，戎兵接而宫庙隳，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诗》所谓“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八王之谓矣。^①

西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 306 年)“八王之乱”平定，十年之后的建兴四年(公元 316 年)，晋愍帝不得不投降前赵，西晋灭亡，仅仅统治中国 51 年之久。次年，晋朝皇族司马睿在建康称晋王(公元 318 年称帝)，是为晋元帝，史称东晋。东晋本身并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主要是凭借长江天险偏安江南；丞相王导依靠联合南迁避难的中原士族及南方大族，以稳定政局。时有外部军事入侵，加之南北大族之间频生龃龉，导致东晋政权并不稳定。政局动荡，民不聊生，这是本书主角葛洪生活时代的大背景。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今江苏丹阳)人，两晋著名思想家，道教外丹学

^① 《晋书》卷五九《汝南文成王亮等八王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627 页。



派集大成者。葛洪生于西晋武帝太康四年(公元283年)^①,其家原为东吴氏族,祖父葛系为东吴大鸿胪,从祖葛玄为著名道士,其父葛悌仕吴为会稽太守,吴平后入晋历任太中大夫、邵陵太守等。十三岁时葛悌去世,葛洪“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②,不得不开始过贫困的耕读生活:

饥寒困瘁,躬执耕耨,承星履草,密勿畴袭。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荡尽。农隙之暇无所读,乃负笈徒步行借。又卒于一家,少得全部之书,益破功日伐薪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家贫,葛洪接受传统儒家教育较晚,根据其自述,“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而且所学颇杂,“曾所披涉,上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既性暗善忘,又少文,意志不专,所识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时犹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纯儒,不中为传授之师”。^④故此,葛洪虽年少便以儒学知名,但是其所学并不专一。葛洪早年亦曾师从郑隐学道,而后者是葛洪从祖葛玄之弟子,所以葛洪师从郑隐,近乎家学传授。

无论学儒抑或学道,葛洪并未完全脱离社会。西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葛洪时年二十,荆州流民张昌起义,其部将石冰攻占江、扬二州,波及东南大部地区。“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玘等起兵讨之,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尽管立有军功,但是葛洪却未接受封赏,投戈释甲前往洛阳求学,恰逢“八王之乱”,北上道路阻绝,而陈敏又于江东作乱,归途不得,葛洪遂不得不周旋于徐、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此

① 《晋书》卷七二《葛洪传》中并未具体说明葛洪出生年代,葛洪本人所传世之《抱朴子内外篇》等著作,包括《抱朴子外篇》卷五〇《自叙》中亦未曾提及。根据《太平御览》卷三二八所引《抱朴子外篇》佚文:“昔太安二年,高邑始乱,三国举兵攻长沙王义。小民张昌反于荆州,奉刘尼为汉主。乃遣石冰击定扬州,屯于建业。宋道衡说冰求为丹阳太守。到郡,发兵攻冰。召余为将兵都尉,余年二十一。”罗宗强先生考论,平定张昌之乱在西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时年葛洪二十一,故当生于西晋武帝太康四年(公元283年)。钱穆先生在《葛洪年谱》(1946年)中亦持此论。

② 《晋书》卷七二《葛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11页。

③ 《抱朴子外篇》卷五〇《自叙》。参看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53页。

④ 《抱朴子外篇》卷五〇《自叙》。参看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55页。

一时期可以视为葛洪一生的早期。虽为世族,但是由于政治变故加之年幼失怙,葛洪早年并不幸福,与真正的世族纨绔子弟相比,葛洪对于社会有更多的了解。这一早年经历,可以说也反映在其后所著述的《抱朴子外篇》一书的思想中。

西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八王之乱”虽于当年平定,但是王朝已经乱象频生,积重难返,十年后终为匈奴所灭。当年嵇含为广州刺史,上书以葛洪为参军,其时葛洪年二十三。据《晋书》本传所言,葛洪南行之初衷为“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其人先至广州,嵇含未至而遇害,葛洪不得不滞留南土,隐居罗浮山^①,其后葛洪“还乡里,礼辟皆不赴”。由于史籍未录,葛洪还乡日期已不可考,罗宗强先生以为时值西晋愍帝建兴二年(公元314年),未知所据。司马睿任丞相后,葛洪被辟为府掾。据钱穆先生推论,其时当为西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葛洪年三十三。其后以平贼功,赐侯爵。^②至于具体年份,罗宗强先生推论当为东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时年葛洪三十五,司马睿即晋王位大加封赏,赐葛洪关中侯;钱穆先生根据葛洪自叙“庚寅诏书赐爵关中侯”,以“庚寅”为“庚辰”笔误,推论为东晋元帝大兴三年(公元320年),时年葛洪三十八。从远赴广州担任参军至此十余年间,是葛洪的中年时期,期间出现如下两件大事:

一是师事南海太守、道士鲍玄(鲍靓,字太玄),并娶其女为妻。《晋书》卷九五《鲍靓传》中言“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云笈七签》卷一〇六《鲍靓真人传》言其曾从左慈学,能役使鬼神。以《晋书》本传行文次序,此事记于葛洪平定石冰之乱以前,亦即葛洪二十岁之前,其时葛洪在句容生活。钱穆先生对此表示怀疑,猜测可能是西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罗宗强先生猜测大约是其三十岁时,即西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左右;日本学者洼德忠认为,“葛洪师事鲍靓受业仙说、仙术的时期及地点均不详,据大渊忍尔推测,那是在东晋初期(公元317年之后)鲍靓辞去南海太守隐居句容附近的时候”。^③王承文在其《葛洪早年隐居罗浮考论》中有详细论证,认为“葛洪

① 据《晋书》葛洪本传及《抱朴子外篇·自叙》,仅提及此时葛洪隐居南方,“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并未指明所居何地。《晋书》言葛洪老年事时,明确指出止居罗浮山,但据东晋名士袁宏所著《罗浮记》,明言葛洪此时已经“憩于此山”。究竟是葛洪先后两次隐居罗浮,还是文献有误,不得而知。《晋书》乃唐人所为,虑及文献先后次序,本书暂从袁宏所说。

② 《晋书》本传作关内侯,《抱朴子外篇·自叙》作关中侯。按魏晋爵制,关内侯高于关中侯。两种侯爵是有先后次序抑或记述有误,不得而知。

③ [日]洼德忠:《道教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师事南海太守鲍靓正是在葛洪早年隐居罗浮期间”。^① 无论具体何年，葛洪的确曾师承鲍靓，“葛玄—郑隐—葛洪”和“左慈—鲍靓—葛洪”的传承亦应属存在，其中道教的因素显而易见。

二是完成《抱朴子内外篇》的写作。

江表书籍，通同不具，昔欲诣京师索奇异，而正值大乱，半道而还。每自叹恨。今齿近不惑，素志衰颓，但念损之又损，为乎无为，偶耕蕲泽，苟存性命耳。博涉之业，于是日沮矣……

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按：建武为东晋元帝年号，仅存两年，公元317—318年）。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为《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别有目录。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

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难曰：“昔王充年在耳顺，道穷望绝，惧身名之偕灭，故自纪终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运，方将解申公之束帛，登穆生之蒲轮，耀藻九五，绝声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易，而务老生之彼务？”洪答曰……^②

根据上述材料，可见此时葛洪大体已经完成《抱朴子内外篇》的写作，其后又多次进行了修订。《抱朴子外篇·自叙》一节可能作于葛洪晚年，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六“道家类”中认为，“是编（《抱朴子内外篇》）乃其乞为句漏令后，退居罗浮山时所作”，恐非恰当。

自受封侯爵之后（公元315年？317年？）至东晋成帝咸和年间（公元326—334年），十余年间葛洪行迹史籍缺载，其《自叙》亦未曾言及，盖此十年间葛洪当在故里隐居。咸和初年，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后经干宝推荐，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葛洪坚决推辞不就。因为年事

① 王承文：《葛洪早年隐居罗浮考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② 《抱朴子外篇》卷五〇《自叙》。参看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60、698、715页。

已高,葛洪属意炼丹以求长寿,听说交趾产丹砂,故求为句漏令。最终得到晋帝许可,葛洪带领家人子侄同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邓岱)^①所留,乃上罗浮山炼丹。根据《资治通鉴》咸和五年(公元330年)条云:“以邓岳督交、广诸军事,领广州刺史”,则葛洪此次南行必在此之后。

葛洪“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前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葛洪退居罗浮山之时作《抱朴子内外篇》,盖以此为据。其后某日,葛洪突然书信邓岳,“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未及邓岳赶到,葛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是为葛洪晚年生平。

以上为葛洪大致生平,总体而言其早年记载较为清晰;中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不明之处虽多但争议不大;葛洪晚年由于史料记载龃龉,争论纷纷,尤其是卒年问题,先后相差二十余年。下面但就葛洪卒年一事,另行论述。

二、葛洪卒年考

关于葛洪本人的生平资料,相对而言比较丰富,主要原始材料有《晋书·葛洪传》以及《抱朴子外篇·自叙》,其余如《罗浮记》、《晋中兴书》、《道藏》等对于葛洪的生平亦有涉及。学界对于葛洪生平的研究较为充分,如钱穆先生的《葛洪年谱》、李光富的《葛洪行实考略》等^②,对葛洪相关的经历加以系年研究;但是就葛洪卒年一题,似有再作探讨的余地。

(一)关于葛洪卒年的各种争论

关于葛洪卒年的争论,主要有不足六十岁说、六十一岁说、六十三至六十五岁说和八十一岁说四种,其中以六十一岁说和八十一岁说影响较大。各说及其所持证据大致如下:

1. “不足六十岁说”

不足六十岁说主张葛洪卒于东晋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之前。钱大昕在其《疑年录》中谓其卒于咸和(公元327—334年)中,未必可信。钱穆

① 邓岳:本名岳,以犯康帝讳,改为岳,后竟改名为岱焉。《晋书》卷八一《邓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31页。

② 钱穆:《葛洪年谱》,《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三册,台北: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李光富:《葛洪行实考略》,《成都师专学报(文科版)》1993年第2期。



先生在《葛洪年谱》中认为，邓岳（邓岱）伐夜郎一事，《晋书》本传系之于咸康三年，《帝纪》系之于咸康二年十月，邓岳卒年史不著；《通鉴》记载，康帝建元元年，以庾冰都督荆、江、宁、益、梁、交、广七州。“似邓岳之卒，尚在康帝前，其弟逸亦不久去位。若如《洪传》，洪寿八十一而卒，应是在哀帝兴宁二年，邓岳决不至是尚在。今既知洪先邓岳卒，则其寿殆不出六十也。《寰宇记》一百六十引袁彦伯《罗浮记》作葛洪卒时年六十一，若果可据，应为康帝建元元年，其时邓岳殆已卒，洪决不在人世。”^①

2. “六十一岁说”

六十一岁说主张葛洪卒于东晋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最早见于东晋袁宏所著之《罗浮记》^②，近人大多持此观点，如侯外庐、陈国符、陈飞龙、胡孚琛、杨明照、丁宏武等皆持此说。^③ 具体证据如下：

（1）现存最早的材料东晋袁宏所著《罗浮记》中明指葛洪卒于六十一岁。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也……于此山积年，忽与岱书云：当远行寻师药，克期当去。岱疑其异，便狼狈往别。既至而洪已亡，时年六十一。^④

（2）葛洪卒于邓岳（邓岱）之前，考证邓岳的卒年如下：

邓岳，字伯山，陈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讳，改为岳，后竟改名为岱焉。^⑤

八年六月庚寅，成帝不豫，诏以琅琊王为嗣。癸巳，成帝崩。甲午，即皇

① 钱穆：《葛洪年谱》，《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三册，台北：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② 乐史：《太平寰宇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1页。

③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3页；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7页；陈飞龙：《葛洪年谱》，见朱传誉《葛洪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2页；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06页；丁宏武：《葛洪卒年考》，《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④ 乐史：《太平寰宇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1页。

⑤ 《晋书》卷八一《邓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32页。

帝位，大赦。^①

晋康帝于咸康八年(公元342年)登基，改元建元，故邓岳于建元元年时尚在人世，需要改名避讳。

(3)邓岳离任广州刺史的大体日期在兴宁元年(公元363年)以前，因此葛洪不可能卒于此时。

岳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干。岳卒后，以逸监交广州、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②

并子含，初为庾冰轻车长史，讨苏峻有功，封夏阳县开国侯，邑千六百户，授平南将军、广州刺史。^③

(升平五年，公元361年)二月，平南将军、广州刺史、阳夏侯滕含卒。^④

邓岳卒后，广州刺史一职由其弟邓逸接替，邓逸不久离任，其职先后由滕含等人担任。丁宏武先生考证：“在永和十年至升平五年(公元354—361年)，广州刺史是滕含……谢奉任广州刺史的时间就在升平五年(公元361年)二月至兴宁元年(公元363年)之间。既然如此，兴宁元年的广州刺史绝非邓岳，葛洪也不可能卒于此时。”^⑤刘剑锋先生认为，邓岳卒于庾冰之前(晋康帝建元二年，即公元344年)：“滕含为庾冰的部下，在平苏峻叛乱中有功被授予平南将军，并被庾冰举荐任广州刺史，这时邓岳已未担任广州刺史，而且其弟邓逸也已经不是广州刺史了，所以邓岳应当已经去世。可见邓岳应卒于庾冰之前。”^⑥故此，葛洪卒于庾冰之前，亦即晋康帝建元二年(公元344年)。

3. “六十三至六十五岁说”

六十三至六十五岁说主张葛洪卒于东晋穆帝永和元年至永和三年之间(公元345—347年)，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持此观点。罗宗强以《神仙传》所载平仲节于晋穆帝永和元年(公元345年)成仙之事为据推

① 《晋书》卷七《康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4页。

② 《晋书》卷八一《邓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32页。

③ 《晋书》卷五七《滕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54页。

④ 《晋书》卷八《穆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5页。

⑤ 丁宏武：《葛洪卒年考》，《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⑥ 刘剑锋：《论葛洪的生卒年及相关问题》，《船山学刊》2005年第4期。